

区域动态（东南亚）

本期推介《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通过东南亚与全球相遇》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onial Imaginary: Global Encounters via Southeast Asia

【编者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加强，殖民主义的文化影响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通过东南亚与全球相遇》一书从更细微的历史角度探讨当地殖民互动，以跨文化交流为框架，通过跨帝国视角阐明文化习俗和知识流动的多线轨迹，描绘文化如何在殖民背景下不断演变。在书中，作者介绍了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并探讨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的方式。作者指出，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文化认知和理解的过程。作者分析了殖民幻想的概念和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殖民幻想是指在殖民地时期，殖民者对于被殖民地文化的理解和想象，这种幻想往往带有偏见和刻板印象，影响了殖民者对于被殖民地文化的看法和态度。跨文化交流可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相互理解，但也可能带来文化冲突和认同危机，而殖民幻想则可能导致文化压迫和剥夺被殖民地的权益。

该书批判将历史划分为殖民前、殖民时期和殖民后阶段的传统时期划分法，认为这种划分会掩盖文化流动的连续性。在对殖民历史的重新审视中，作者指出标准的统治叙事忽略了殖民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跨文化交流如何既支持又破坏荷兰殖民合法性，揭示了殖民社会的众多动机、世界观和代理程度，展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多样性。东南亚有着多样化种族、语言、宗教、历史、移民和贸易量的不同国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个交流和联系的场所，换句话说，东南亚的人民拥有经过几个世纪演变的独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避免将某些文化视为“次等”或“不重要”的，通过平等、开放、包容的方式来进行跨文化交流，才能真正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ONIAL IMAGINARY
Global Encounters via Southeast Asia



《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的编者哈泽尔·韩（或译为韩海静，Haejeong Hazel Hahn）执教于西雅图大学，任历史学系主任。在对欧洲历史及殖民史的研究中，她更多地关注欧洲与东南亚的互动。在本书中，包括韩在内的十位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研究对象横跨建筑、服装、音乐、社团等多个领域，多侧面呈现了东南亚作为场域、载体和主体，与欧洲及更广阔世界间的互动。东南亚在本书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从对锡兰（斯里兰卡）相关研究的囊括也可见一斑。本期推送的两篇书评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第一篇书评全面介绍了本书的篇章排布及主要内容，第二篇则批判性地探讨了本书编写的主要逻辑和有待进一步挖掘的内容。

《皇家亚洲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学报》（*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021 年刊印了尼古拉斯·韦伯（Nicolas Weber）对于《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一书的书评，韦伯长期研究越南及占族（Cham）历史，现任教于越南富布莱特大学。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本书引人入胜且发人深省，汇集了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十个案例研究，为观察和理解殖民及后殖民时期东南亚的社会文化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洞见。各位撰稿人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讨论了跨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融合、适应、挪用和抵抗等议题，他们超越了关于殖民背景下思想传播及影响的常见研究问题，也对殖民者-被殖民者的简单二分提出了质疑。

这些文章主要覆盖了三大方面的文化交流：知识、材料与建筑、以及艺术休闲。

第一章是乔治·达顿 (George Dutton) 的“从他者的视角看十九世纪葡萄牙：菲利佩·平的日记 (*Nineteenth-century Portugal Through Other Eyes: The Diaries of Philiphê Binh*) ” (第 25-48 页)，从越南耶稣会神父菲利佩·平的日记展开。平于 1796 年到 1833 年间居住在葡萄牙 (主要是里斯本)，在他的日记中，一位年轻、开明的北越青年对葡萄牙、特别是其制度和饮食方式等方面做出了客观而独到的描述。不同于他的西方同行，平写作的目的是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教育他的读者，给未来的越南访客提供一部旅行指南。

第二章是马修·杰·沙乌尔 (Matthew J. Shauer) 的“收集马来遗产：二十世纪早期英属马来亚的学术社团和帝国政策 (*Collecting Malay Heritage: Scholarly Societies and Imperial Policy in British Malay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 (第 49-74 页)，考察了马来亚当地和全球知识社团构成的网络所发挥的作用。例如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和皇家巴达维亚艺术与科学学会 (Royal Batavian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致力于通过收集、分享民族学知识，保护和传承马来文化。知识社团的工作不仅在于保护被殖民者的文化，还在于提高殖民者的认识、提高治理的“文化敏感”性。

第三章是阿诺特·范德米尔 (Arnout H. C. van der Meer) 的“仪式与权力：跨文化交流与印尼殖民霸权的争议 (*Rituals and Power: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Colonial Hegemony in Indonesia*) ” (第 75-104 页)，研究跨文化交流如何增强和削弱荷兰在晚期爪哇殖民地的合法性。文章阐述荷兰人如何在 20 世纪初的爪哇使用爪哇文化元素 (如尊重传统、服装、权力象征和建筑等) 使殖民权威合法化。随之而来的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对这种混合文化系统的拒绝以及他们对西方方式、言论和服装的推崇——这代表了他们为现代化和挑战殖民政权做出的努力。

第四章是道恩·奥德尔 (Dawn Odell) 的“荷属东印度的“中国”屏风 (*'Chinese' Screens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 (第 107-130 页)，聚焦印度尼西亚的文化挪用：即被称为“影皮” (yingpi) 和“堆叠” (heaping) 的中国屏风被移植到欧洲人在巴达维亚的家中，挑战了传统的东亚习俗，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定义了一种独特的巴达维亚风格。

第五章是哈泽尔·韩的“缺失的叙述与失落的珠宝：胡志明市泰米尔寺庙的文化遗产 (*Absent Narratives and Missing Jewels: Cultural Heritage of a Tamil Temple in Ho Chi Minh City*) ” (第 131-161 页)，重构了泰米尔印度教丹达乌他帕尼庙 (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的历史。这座寺庙在 1880 年左右由来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切蒂亚尔 (Chettiar, 译注：泰米尔人族裔，该种姓传统上主要从事商贸尤其是宝石生意、银行信贷活动等) 放贷者建立。庙宇建筑有着惊人的融合特征和造型罕见的塔楼 (vimana, 圣殿上的塔楼)，可谓是殖民时

期西贡丰富复杂的跨文化交流历史的一个缩影。文章探讨了泰戈尔 1929 年访问西贡所产生的影响，越南人和印度人对寺庙的看法和对传统及身份认知的变化，最后总结寺庙的当代用途和地位。

在第六章“法式木结构建筑与越南总督宫殿？越南殖民地的建筑交流（*French Nhà Rường and a Vietnamese Palace for the Governor? Architectural Exchange in Colonial Vietnam*）”

（第 162-186 页）中，卡罗琳·赫贝林（Caroline Herbelin）考察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文化交流以及文化挪用和跨文化交流的机制。她聚焦研究了两个案例：河内的总督府和 20 世纪 30 年代交趾支那乡村富裕家庭对“法式”建筑的本地化改造。作者希望读者重新思考过度简化的“本土”与“殖民”，西方与东方，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区分。

第七章是莎拉·莫泽（Sarah Moser）的“殖民都市主义在马来西亚布城的拒绝与再生（*Rejecting and Reproducing Colonial Urbanism in Putrajaya, Malaysia*）”（第 187-214 页），探讨了英国殖民都市主义近期在马来西亚新行政中心布城的挪用。作者认为，布城延续了殖民时代的都市主义实践和美学（如“花园城市”和分区、植物园、“新镇”、异国情调的东方主义风格等），保留了以种族和宗教隔离为代表的殖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反映马来西亚的多民族、多文化社会。

在第八章“背景与内容：锡兰康提的殖民时代照片（*Context and Content: Colonial Photographs from Kandy, Ceylon*）”（第 217-238 页）中，作者贝尼塔·斯坦布勒（Benita Stambler）聚焦于殖民时代的照片、明信片 and 版画。这些作品描绘了康提的社会和宗教制度的一些侧面，比如贵族、佛牙寺以及传统舞蹈等。这些作品中的图像或许有助于欧洲的西方人更熟悉锡兰的人民和文化，但并不准确的描绘加上对这个岛屿文化传统匮乏的认知和理解，实际上起到持续传播误会与曲解的反作用。

第九章“穿得更加异域：二十世纪初爪哇的越界着装（*Slipping into Something More Exotic: Transgressive Dres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Java*）”（第 239-262 页）审视了欧洲人与爪哇人通过着装的相遇。作者苏西·普罗茨基（Susie Protschky）分析了两个殖民时期爪哇出现的种族越界着装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展示了两个穿着爪哇服装的荷兰女孩的照片，第二个案例则是关于一位在欧洲公开场合穿着爪哇宫廷舞者（*serimpi*）服装的印欧女性的记述。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为了公众欣赏而穿着爪哇服装，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并因此引起不同的殖民和后殖民反应。

第十章是弗雷德里克·杰·申克（Frederick J. Schenker）的“爵士乐与大英帝国：亚洲爵士乐手的崛起（*Jazz and the British Empire: The Rise of the Asian Jazz Professional*）”（第 263-

279 页），回顾了爵士乐在亚洲的传播以及菲律宾音乐家的重要角色。这一音乐流派被视为现代性和欧洲性的载体，它的传播导致了一个新的劳动类别的产生：职业爵士乐手。作者表明，这一新专业阶层的出现促进了东南亚的流动性，挑战了帝国劳动实践。

这本引人入胜的文集提供了关于殖民交流物质性的丰富证据，它包含了大量的图像、索引以及精选参考书目。对关注东南亚社会历史、跨文化交流和文化挪用、以及殖民和后殖民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本书值得一读。

（英文原文见 Weber, N. (2021). [Review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onial Imaginary: Global Encounters via Southeast Asia, by H. Hazel Hahn].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94, Part 2, No. 321, December 2021, pp. 210-212, 本文为开放获取）

《东南亚研究期刊》（*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22 年发布了另一篇对《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一书的书评，作者高村和惠（Kazue Takamura）为麦吉尔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高级讲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跨国移民、东南亚华人移民。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在关于殖民主义的当代学术研究中，文化是理解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权力动态的重要视角。学者们一方面记录下了殖民文化项目的深刻侵略性：它们暴力剥夺了原住民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讨论了被殖民者坚韧、日常和混合的文化空间。文化混合性（hybridity）的理念对于支持自下而上立场的人尤为重要，因为它为挑战殖民文化话语的主导性和重写殖民历史开辟了机会。

然而，第三个重要的立场是，关注殖民者为获得政治合法性，对本土性的挪用。殖民者对本土性的挪用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当时殖民者转变了文化政策，通过管理本土文化，服务其巩固权威的明确政治目标。杜宁凯（Nicholas Dirks）颇具影响力的作品阐述了这一洞见，分析殖民活动在构建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作用。根据杜宁凯的研究，殖民主义是一种“控制的文化项目”，因为关于殖民地本土的知识“使征服成为可能，并由此产生”（杜宁凯，《心灵的种姓：殖民主义与现代印度的形成（*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2011 年，第 9 页）。本土性在殖民结构内的表达反映了一种目标明确、旨在维持殖民统治的权力动态。

《跨文化交流与殖民想象》是一本关于东南亚历史的有趣合集，它重新审视了有争议的殖民话语中的文化边界和身份认同问题。编者哈泽尔·韩挑战了假定殖民文化主导的“殖民文化的标准叙事”（第 1 页）。通过“跨帝国框架下的物品流动、文化实践和文化知识的多线性轨迹”（第 2 页），被殖民者不再被视为殖民文化的被动接受者。文化混合性的概念，尤其是文化边界的可塑性，是理解编者所视的“跨文化交流”概念的核心。

例如，哈泽尔·韩通过当地、殖民和后殖民叙事，研究西贡印度泰米尔寺庙的“文化遗产政治”的历史，重新审视殖民空间性。作者阐明南亚移民到交趾支那的丰富但鲜为人知的历史，特别是西贡泰米尔寺庙中的文化混合性特征，这种特征根植于与法国殖民者以及越南本地人的日常互动中。卡罗琳·赫贝林的章节沿着韩的跨文化主义视角，以河内总督府和越南富人在交趾支那乡村建造的法式住宅为基础，对文化借用进行了空间分析。本书还收录了关于跨越边界的原创性研究，例如乔治·达顿记录的一位越南天主教神父对十九世纪里斯本日常生活的观察；苏西·普罗茨基基于性别的分析，审视了殖民时期爪哇和欧洲种族越界的着装，一位印欧混血女性的身体在此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场域；以及弗雷德里克·申克研究菲律宾爵士乐手在亚洲殖民地的劳动流动，以及他们对爵士乐新的本土意义的构建。

韩的视角集中于横向交流的混合和共享模式，但关于殖民文化互动的第三个立场，即殖民对本土性的挪用，编者其实可以更多地展开讨论。这种殖民挪用在自上而下、渗透性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过程收集、重新解释并创造“真正的本土性 (authentic indigeneity)”，以使殖民统治合法化。其中三个篇目的作者，阿诺特·范德米尔、莎拉·莫泽和马修·沙乌尔，尤其出色地发展并呈现了这些洞见。这三位作者分别从本土性的殖民表达（范德米尔）、本土性的殖民话语（沙乌尔）和本土性的殖民挪用及其长期遗留影响（莫泽）探讨了殖民与本土性的互动。殖民对本土性的选择性消费也有所体现，尽管不太明显，主要体现在贝尼塔·斯坦布勒关于英属锡兰“土著”照片制作的章节中。

阿诺特·范德米尔根据他对荷属东印度的档案研究，对本土性的殖民表达及其不满进行了有力的分析。他考察了二十世纪初围绕荷兰殖民官员为了建立殖民权威而进行的爪哇敬礼仪式（这些仪式统称为“霍马特 (hormat)”，意为尊敬）的公开辩论。据范德米尔所述，“通过采用爪哇的仪式和权力象征，荷兰人试图使相应的权力概念为己所用，从而使他们成为“本地的”一部分 (make them relevant)”（第 78 页，原文强调此句）。这种对本土性的殖民操纵受到了受荷兰教育的年轻爪哇官员以及荷兰官员中一小群进步精英的挑战。殖民者的进步派拒绝接受霍马特，认为它是无效的；同时寻求一种与帝国统治相一致且更为现代

的致礼方式。尽管对文化治理的观点不同，但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殖民立场都反映了他们对潜在合法性丧失的道德焦虑，以及文化作为权力技术的中心地位。

范德米尔展示了本土性的殖民表达具有的侵略性和碎片化本质，沙乌尔则探讨了本土性的殖民话语，特别是殖民业余学者的作用，及其对英属马来亚“真正的马来遗产”的知识积累。他指出，“英国人希望利用这些知识，不仅培训公务员，而且通过挪用、重新解释和强化马来文化传统来帮助治理”（第 52 页）。尽管对“真正马来传统”的殖民推广被呈现为一种殖民者的仁慈，但实际是建立殖民道德优越性的必需品。

莎拉·莫泽关于马来西亚都市主义的研究涉及本土性的殖民表达，她的重点是对源于殖民主义的“真正本土性”的后殖民继承。莫泽审视了在新建立的行政中心布城的城市规划中殖民价值观的持续性，比如异化的马来-穆斯林身份和种族隔离策略。尽管他们宣称想要与殖民历史脱去关系，但与执政党有联系的城市规划者在建立他们的道德和政治合法性时，还是拿起了英国文化工具箱。沙乌尔的章节讨论了对“真正的马来”的殖民话语建构，莫泽则剖析了这种殖民话语的长期遗留影响。

权力在殖民文化交流中的中心地位在此显而易见。殖民对本土性的推广不是控制的终结，而是一种复杂精细的控制模式。通过将文化视为动态、不断发展和可塑的过程，编者组织了一卷有趣的文集，但殖民的“跨文化交流”的深刻侵略性和有害性或可展开更有效地讨论。以表演、话语和消费的形式对“本土”的殖民挪用，不应仅仅被简化为本土对西方的影响。正如范德米尔正确指出的，“混合文化不仅仅是东南亚殖民主义的偶然副产品，而是维系其运作的本质”（第 77 页）。

（英文原文见 Takamura, K. (2022). [Review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onial Imaginary: Global Encounters via Southeast Asia, by H. Hazel Hah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ume 53 , Issue 3, October 2022, pp.594 – 597.

DOI: <https://doi.org/10.1017/S0022463422000637>，本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王晓峰

编译：陈俊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